

历时性视角下异化与归化在戏剧翻译中的策略选择——以 The Silver Box 郭沫若和裘因译本为例

曹伟钰, 张欣玥, 陆昱洋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100083

DOI: 10.61369/SSSD.2026080003

摘 要 : 英国剧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的戏剧作品 The Silver Box 作为揭露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剧作, 其影响从最初引入中国时到改革开放实施期间经历了深刻变化。本研究以 The silver Box 两中译本为研究对象, 旨在通过历时性视角探索不同时代背景下的译者在异化与归化选择上的差异, 并深究其背后的历史动因。研究表明, 郭沫若立足五四后期的时代需求, 在翻译时倾向于使用归化; 而裘因根据改革开放的时代需求偏向于使用异化。通过对两中译本的对比, 本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异化与归化理论在不同时代戏剧翻译中的选择倾向与差异, 为翻译方面的历史动因研究提供了借鉴。

关 键 词 : 戏剧翻译; The Silver Box; 归化; 异化; 历时性

Strategic Choice Between Foreignization and Domestication in Drama Translation from a Diachronic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Guo Moruo's and Qiu Yin's Versions of The Silver Box

Cao Weiyu, Zhang Xinyue, Lu Yuya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Abstract : As a realistic drama that exposes social problems under capitalism, The Silver Box by British playwright John Galsworthy has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in its influence from its initial introduction to China to the period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aking the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Silver Box as research objects,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in translators' choices between foreignization and domestication against different historical backgrounds from a diachronic perspective, and probe into the historical motivations behind them. The study shows that Guo Moruo, based on the social needs of the late May Fourth period, tended to adopt domestication in translation, while Qiu Yin preferred foreignization in line with the needs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era. Through a comparison of the two Chinese versions, this study further reveals the tendenc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choice between foreignization and domestication in drama translation in different eras,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motivations in translation.

Keywords : drama translation; The Silver Box; domestication; foreignization; diachronicity

引言

英国剧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是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 被誉为20世纪最优秀的剧作家之一。The Silver Box 是他创作的第一个剧本, 作品以19纪末和20世纪初的英国社会为背景, 从对贫富的不公正待遇以及资产阶级的伪善和自私两方面进行有力地抨击, 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戏剧作为文学领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承载着文化传递和艺术再现的重任。其翻译在引领人民思想, 反映人民精神风貌方面同样起着重要作用。The Silver Box 现存的译本, 即郭沫若译本《银匣》与裘因译本《银烟盒案件》, 由于翻译时间相距甚远, 翻译策略与译文内容存在巨大差异。其中在异化与归化策略上的选择差异尤其突出。在此基础上, 本研究希望通过历时性视角, 考察两位译者在异化与归化策略上的不同选择, 并探讨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和翻译目的。本研究旨在揭示戏剧翻译策略选择的动态演变规律, 为当下戏剧翻译实践提供借鉴。

项目信息: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资助”(项目编号: 202408008)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曹伟钰(2003.01—), 女, 江西上饶人, 汉族,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本科生在读, 研究方向为翻译方向。

一、理论依据

（一）异化与归化理论

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L. Venuti）于1995年出版的出版著作《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中提出归化（domestication）即是把源语言本土化。异化（foreignization）则是在翻译上以源语言文化为归宿，保留源语言文化特色。归化翻译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而使用异化策略能够保留外国文化风情。（冯全功，2019）。

在韦努蒂看来，异化与归化是一种道德选择，使译文能够破坏文化的陈规，陌生化读者的文化概念，从而达到传达新思想、新概念的目的（郭建中，2008）。同时，翻译的异化与归化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在研究翻译的归化与异化时，应该采取辩证的态度（冯全功，2019）。

（二）历时性视角

“历时性”一词最早出现在语言学的研究中，它由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用于研究语言在历史中的起源与演变，观察语言在较大历史时期中所经历的变化。其与观察一种或多种语言在历史发展中某一阶段的情况的“共时性”研究相对应。而在翻译中，翻译语言的价值形态也具有历时演变的特点，会受到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时空、性别和双重身份等。由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翻译语言的价值形态也会有所不同（史江静，2024）。

（三）戏剧翻译的特点

戏剧翻译相比其他文学翻译，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语言的通俗性。戏剧翻译需要让观众理解对话内容，因此需要以尽量贴合观众习惯的语言进行翻译。二、语言的简洁性。不同于可以反复阅读的其他文本，戏剧表演是即时发生的，一旦错过便无法重复。此外戏剧表演还受制于一定的时间限制，因此戏剧翻译时应该尽量使语言简洁流畅。三、语言的动作性。戏剧的动作性并不局限于肢体的动作，人物的心理活动也会通过语言表达出来。因此戏剧的翻译需要突出语言中隐含的情感与矛盾。在不同语境下，翻译者需要调整语言的翻译，以便观众认识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冲突，方便剧情的理解（刘本利，2021）。

二、The Silver Box 两译本中翻译策略的历时性分析

（一）郭沫若《银匣》译本翻译策略的历史动因

郭沫若的《银匣》译本最初由上海现代书局于1927年出版。20世纪20年代中期，五四运动迎来落潮，中国社会发生了新的变化。同时，在此背景下，为了顺应当时时代发展的需要，更好地向大众传播戏剧作品中的启发思想，郭沫若在《银匣》的翻译中更多地选择了归化策略。为顺应新文化运动与政治革命的时代特点，文学翻译多以感时忧国、改造社会为目的，十分重视现代主义作品的翻译与传播，其中重点关注与中国国情相近的作品（赵群，2014）。在救亡图存的思想驱使下，翻译家更多地选择本土

化的语言来打破文化壁垒，以达到快速传播思想的目的。同时，革命意识大众化也是当时的重要主题，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能够更好地实现思想下沉，让民众产生共鸣，从而激励人们参与到社会变革中去。作为翻译家，郭沫若主张“风韵译”，提倡翻译要实现内容、形式和神韵的统一。同时，他还认为译者应当具有创作精神，认为翻译也是一种创作（赵群，2014）。在《银匣》的翻译中，郭沫若同样注重归化的翻译方法，使剧本语言通俗易懂，极具时代特点，以实现传播新思想、助力新变革的时代任务。

（二）裘因《银烟盒案件》译本翻译策略的历史动因

裘因的《银烟盒案件》翻译实践（1991）植根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特有的文化转型期。1978-1992年间，中国译介活动呈现两大特征：其一，文化输入量激增，但读者群体仍受限于长期封闭导致的认知断层；其二，翻译理论界正处于传统范式与西方新论的碰撞期，形成“归化惯性”与“异化觉醒”并存的特殊张力。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阶段，随着国门的进一步打开，外国文化作品大量涌入中国，翻译文学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受到了广泛关注。中国读者对于西方文学的好奇心激增，但长期的文化隔阂导致译作者需兼顾“可读性”与“原汁原味”（孙致礼，2002）。受以上因素影响，裘因在《银烟盒案件》的译介活动中主要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通过异化处理部分意象以及修辞风格，满足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读者渴望通过译本了解真实西方社会的需求。

三、The Silver Box 两译本中翻译策略的选择

（一）郭沫若《银匣》译本中的归化策略实例分析

在20世纪20年代特殊的时代与翻译理论发展背景下，郭沫若的《银匣》翻译中多使用归化的翻译方法。这一特点在文化意象和修辞风格两个方面有突出体现。

1. 文化意象

文化意象作为一种语言符号，能在特定人群中产生情感共鸣（尹舒，2016）。归化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文化意象差异带来的文化壁垒，使译文更易于理解。

【例一】BARTHWICK: Principles! Good Heavens! What have principles to do with it for goodness sake? Don't you know that Jack was drunk last night!

【郭沫若译】白士维：主意！阿弥陀佛！要把这件事情做好，还讲得什么主意吗？你晓得不，昨天晚上杰克喝得一个大醉！

原文中的“Good Heavens”是基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典型文化意象。由于此意象对当时不熟悉西方文化的国人来说较难理解，郭沫若将其进行了本土化翻译，使用了基于东方佛教文化的意象“阿弥陀佛”一词，不仅较为忠实传递了原文的含义，还提高了观众的接受度。

2. 修辞风格

在修辞方面，归化法常在翻译过程中对源语言进行本土化加工，使其符合目的语文化的特征，以达到引起读者或观众共鸣的

目的。

【例二】MARLOW: Not the first time, and won't be the last. Looked a bit dicky, eh, Mrs. Jones?

【郭沫若译】马罗：这样久犯中原，简直没有结局。你看他走路不是有点不稳吗？

此处郭沫若使用了用典的修辞手法，将“Not the first time”译为了具有独特中华文化含义的“久犯中原”。“久犯中原”一词原指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长期侵扰，在此突出杰克长期酗酒这一不良习性的巨大危害。同时，作为家喻户晓的典故，这一词语能够更好地引起国内观众的情感共鸣，并快速理解台词的内涵。

（二）裘因《银烟盒案件》译本中的异化策略实例分析

受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与翻译理论的发展影响，裘因在《银烟盒案件》中主要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体现在文化意象处理及修辞风格四个方面。

1. 文化意象处理

翻译异化策略在处理文化意象时，常采用保留原文文化意象、直译加注释等方法。将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词汇直接译出，并附加注释解释其文化背景，以帮助读者理解。

【例三】UNKNOWN: [Sullenly.] Seven pounds-twelveit's all I've got in the world.

【裘因译】无名女士：（闷闷不乐地）七磅十二先令 那是我在这世上的全部家当。

此处裘因将“Seven pounds-twelveit's”直译为“七磅十二先令”，采用了异化策略译为具体数值。此处保留了英国币制，保留了工业革命时期劳工阶级生存成本的精确计量，强化无产阶级贫困的量化冲击。异化翻译策略通过保留源语的文化意象，使读者直面资本主义经济符号的原始形态，帮助文学作品受众洞悉剧作家对阶级性法律异化与社会财富掠夺的本质批判。

2. 修辞风格

异化翻译策略通常通过保留源语修辞特色强化异域性，使译文呈现外来文本特征，凸显语言文化差异，让读者感受到文学作品跨文化传播的魅力。

【例四】MRS. BARTHWICK. You've no imagination, not a scrap of imagination between you. You ought to join hands and nip it in the bud.

【裘因译】巴斯威克太太：你们没有想象力，你们连一丝一毫的想象力都没有。你们应该携起手来，把这一切都扼杀在萌芽状态中。

此处译者将“nip it in the bud”直译为“扼杀在萌芽状态”，严格对应了植物萌芽的比喻框架。译者保留了原文的比喻结构，这种异化处理使译文产生“翻译腔”，恰与剧中角色故作高雅的说话方式形成呼应，再现了原作人物的阶级特征，满足了读者对西方资产阶级生活的好奇。

四、结语

在不同时代下，译者对异化与归化的选择有不同的倾向和目的。根据韦努蒂的观点，异化与归化代表了一种文化和政治态度，译者在翻译时不可避免会思考社会的文化、道德与政治问题（郭建中，2008）。郭沫若在翻译 The Silver Box 时身处五四后期，在翻译时需要提升剧本的可接受度，从而达到推动思想传播，开启民智的目的，因此在翻译时倾向于使用归化策略。而裘因则身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激烈碰撞，译者在翻译时需要满足读者对西方文化的强烈兴趣，译本有更多异化理论的体现，其使用比重相比郭沫若译本有所提升。这不仅体现了翻译异化与归化策略的社会历史语境差异，也反映了译者的翻译语言与自身的社会背景与文化背景紧密关联，表现了不同时代下译者对于翻译与读者、翻译与社会政治文化问题的思考。

参考文献

[1] 冯全功. 试论归化和异化的生成动因与三个层面 [J]. 中国翻译, 2019, (04): 5-13, 188.
[2] 郭建中. 韦努蒂访谈录 [J]. 中国翻译, 2008, (03): 43-46.
[3] 刘本利. 从《推销员之死》英若诚译本看戏剧翻译的语言特点 [J]. 英语广场, 2021, (21): 55-57.
[4] 史江静. 中国女作家翻译语言价值形态新探——评《20世纪中国女作家翻译语言的价值形态与历时演变》[J]. 中国教育学刊, 2024, (04): 142.
[5] 孙致礼. 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 [J]. 中国翻译, 2002, (01): 39-43.
[6] 尹舒. 浅谈文化意象的“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 [J].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 2016, (04): 175-176.
[7] 赵群. 郭沫若多彩的翻译人生及其辉煌成就 [J]. 兰台世界, 2014, (16): 136-137.